

那幢让人崇敬的小楼

周 媛



等。许多团体、单位的党员干部手捧党旗在一大会址门前合影，一条小街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几乎沸腾了。

我与秦腔剧院的演职人员在会址门口会合了，大家在门前合影后，赶紧加入了参观队伍。趁着排队的工夫，我仔细观看这幢小楼，这是一幢典型的石库门住宅建筑。上海的旧弄堂一般都是石库门建筑，融汇了西方文化和汉族传统民居特点，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这种建筑以石头做门框，以马漆实心厚木做门扇，因此得名“石库门”。

在一大会址的周围，许多建筑都保留着典型石库门的建筑风格，还有一处“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这些都成为上海历史的见证。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领取参观券后，进入内场便有讲解员在迎接了。

一入门便可看到一幅巨型人物浮雕，刻画着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位党员和两位国际代表的形象，青年毛泽东居于正中位置，整幅浮雕造型生动，恢宏大气。

看过浮雕，从旁边一个通道拐过去，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这里聚集了许多观众，这个只有十八平方米的房间，按照当年的会议场景复原布置，房间比想象的要狭小很多，椅子之间的距离很近，桌上放着茶杯。据介绍，客厅里的陈设，均按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根据原样仿制，真实生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身着长衫、中山装、西装的十多位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位于法租界的这个幽静小院，轻轻叩响铜环。七月二十三日，来自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

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秘密汇聚在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即今兴业路七十六号会址），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精致条桌……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我久久凝视着这张桌子，想象着当年中共一大召开的情景，对这个决定着整个中国和人民命运的地方心怀崇敬。除一大会议室外，一楼还有多间小房子，包括会客室、厨房等，布局紧凑。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是一大会址中的重要展览部分，分为“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等专题展区，陈列着大量实物和图片，配合着雕塑和沙盘展示，每处情景都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建党时期的每件文物前都聚集着许多观众，仔细观看每一件文物，似在倾听历史的回响。

中共一大会议的现场是什么情景？从一楼拾级而上，二楼厢相如生的蜡像为人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一间大客厅的正中，围坐着参加会议的十五位代表（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他们坐姿各异，目光坚定，热烈地商讨着，桌上摆放着茶具和烟缸。根据当时会议进展的状况，多媒体投影不时打出一大代表的大幅头像，配合解说词，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二楼楼梯口的一面墙上刻着董必武的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董老以这句出自《庄子·人间世》的名言来说明共产党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毅力，有信心，善始善终地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九二一年至二〇一七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九十六年峥嵘岁月。在展厅一隅，一大会址纪念馆以多媒体声、光、电相结合的新颖形式，再现了党所走过的艰辛而辉煌的道路，引来如潮的参观者。当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现在画面中时，现场爆发出长久而热烈的掌声，人们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中国共产党像今天这样，再次把中国人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流连于此，发现一大会址所在地其实是一处深宅大院，其间有多条通道，布局巧妙。这幢建筑建于一九二〇年秋，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岁月沧桑。此楼房建成后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租用望志路一〇六号、一〇八号为寓所，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一九二二年，李氏兄弟迁居退租，该屋为其他居民租用。一九二四年改建，增建了厢房，楼下开设商店，房屋面目全非。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三十周年，一九五〇年九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经多方勘查，李达、董必武、包惠僧和李书城夫人等多位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现场踏勘，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为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会址在一九五二年后成为纪念馆，一九六一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四年三月，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一大纪念馆题写了馆名。一九九七年六月，这里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二〇一六年九月，中共一大会址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据工作人员介绍，其所在的这片建筑原有楼房共二排九幢，一上一下，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其中南面一排五幢房屋沿兴业路（原望志路），中共一大会址即在西首两幢；北面一排四幢在黄陂南路（原贝勒路）树德里弄内。全部占地面积六百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九百平方米，如今均按当年外貌原状修复，形成一处独具意义的建筑群。

一大会址旁是充满活力和时尚气息的上海新天地，从新天地进去，可以看见这幢建筑的后楼，一面青砖墙面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中国共产党历史从这里开始。”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翻开风云激荡的红色篇章，在历史中汲取力量，为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西直门的名气大。京师九门，只有正阳门的规制盖过它。

西直门，早就没影儿了，光剩下一个地名。

近日为开一个会，我奔了这个地方，去找要住的一家宾馆。走到西直门南小街把口儿，瞅见一群人聚在拐角的居民楼下，楼跟前有多间简易房。几位戴大檐帽的，像是城管执法部门的人，比画着说些什么。一旁，三五个戴头盔的师傅随时要动手的样子。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拆除街头的违章建筑。

我被一个“拆”字撞了心，思绪叫一段旧事带远了。

我念中学赶上闹“文革”。课堂里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多。有一天，轮到劳动课，听说要上西直门，不干别的，拆城楼。动乱年月的孩子，心都野了，撒到外头，班上的男同学那叫一个乐，等于跑郊野玩一趟。

好好的城楼，干吗要拆？深点儿的道理，不是那个岁数的孩子能懂的。听老师讲，拆下来的砖要运到“五七干校”，盖房子使。这跟时下的说法不一样：当年北京建地铁，西直门戳在这儿，挡道儿，所以得平了它。

城楼可没那么好拆。城砖是朝廷指派匠人专门烧制的，块儿特大，几十斤的分量，沉得不得了。我劲儿小，别人不来搭把手，搬不动。砌城墙用的灰浆兑了糯米汁，城砖粘得真叫一个结实。甭看墙体是明清那会儿的，数百年过去，严丝合缝，不见走样。费劲撬下的砖，摆满了马道。砖面上留着挺厚的灰浆，我们拿着铁铲，且刮呢。刮平，码齐，才算完事。我没留神，灰渣一迸，眯了眼睛，烧得慌，赶忙找水冲洗。老师让我先歇会儿。我呢，噌噌几步溜进箭楼，顺着窗孔往下瞧，瞧马路上的车和人。人从门洞里进进出出，车则要贴着城墙南北绕过去。一座城楼，把西直门大街分出内外两截。那会儿，从天桥开来的五路无轨电车就在瓮城里掉头，我对这趟车很熟。我家住西四，车子路过胡同口。电车顶上映着两根杆子，连着架在半空的电线，比起从前的有轨电车，轻巧了不少，也快了不少。

没多久，我远去北大荒，西直门啥时拆完的就知道了。能够想象的是，这座城楼是在一凿一鏊中倒下的，就像昔年在一凿一鏊中矗起一样。

现今，西直门没有了，而地铁贯通了，楼厦建成了。楼厦可比当初的西直门高多了。我住的宾馆也是新的。一连几个晚上，我一躺下，城楼就隐隐地在眼前浮起。我是睡在它巨大的影子里了。

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记得老北京城的模样。好些城门比胡同消失得还早。我们的城市固然不再靠四方门阙守御，可是漫长的城史不能少了它们，不能粗率地夺其位置。假如不去动它们，哪怕少动点，北京该是一种什么景况呢？久远的文化血脉不至于切断，仍在古老的建筑上延伸，通向依然久远的未来。现实的诘问却是严厉的：哪来那么多“假如”？历史不会提供痛悔的机会：因城楼的坍塌而痛，因认知的缺失而悔。就算像重建永定门那样，在旧址仿造一座西直门，也不是原先那个东西了。然而内心的广阔性与思维的致远性，却会提供深省的空间。不敢直视昨日之失，反而加深晦涩，是怯懦的，意味着那覆辙或将重蹈。

世上没有永恒之物。这话却不能成为自我宽谅的理由，更无法使心灵安宁。文物古迹在各种冠冕的旗号下被拆掉了，谁来承

消失的城楼

马力



担责任？当年的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拆城楼，全由老师一人发话，我能怎么做？拒绝吗？可我真的底去了。我虽然没有看见城楼最后倒下的痛苦情状，可我清楚，它的披覆沧桑的躯体毕竟挨过我的铁铲，并引起一阵阵搐动、样缩。我的心头和逝去的城楼一样，刻着深深的瘢痕。

建设与拆除改换着人类的生活环境，也更新着精神内容，甚至拷问参与者的灵魂。以现在的建造技术，地铁线路或可从城楼之下纵贯。几十年前，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工程，也限制了眼界，影响到对事物的看法，乃至对行为的决策。今人能从追溯中得到深一层的启示吗？答案是确定的。历史教训产生于无数个体的错处。每人都充任各自的社會角色，简单地把一切谬误推给过往的年代，再将身子闪避，以为偿清人生之债，也断了情感困扰，不过是可怜的自欺。少年的我，长成老年的我，想通了这个理儿。恍然醒悟是以时间为代价的，沉重如石。

散会后，我顺着来路往家走。街口那几间简易房已拆完，碎乱的砖头瓦块堆在墙角。等到一清走，街面整洁了，盼着门前恢复正常秩序的居民感到舒坦。

抬眼一扫，摩天楼群的玻璃幕墙反射出灼灼光线。我仍陷入默想。西直门巍峨的躯影只映在追忆中，四近因之空旷。

故都的城楼仿佛还雄踞在那里，压着我的心。

灯下漫笔

一片鹅毛

唐国明

鹅毛在飘，在一个神殿里飘着
鹅毛除了洁白，它一无所有
它所有的所有
是让人知道
它只有在风中飞舞时
它才是一片真正的鹅毛

鹅毛如云朵一样在天空飘着
它干净得一无所有，它为了
飞着，不被大地的污泥埋着
鹅毛变成了天空的云朵
如高山顶上的湖泊
无声无息地动着
有时如群鸟

与风呼啸而过

鹅毛到哪儿去了
鹅毛是不是从树干上飘出来
成了带香的花朵

鹅毛到哪儿去了
鹅毛是不是在天空上成了云成了雾
成了我写在纸上的鹅毛体诗歌

有一天，我也会轻如鹅毛
从我的身体里飘出
飘到一个无人知道的王国

那个绕麻绳的年代

桑农



每次到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看到那些古老的物件，总会令人浮想联翩。一次，我站在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去，忽然想起老家墙角那部破旧的麻绳车。

在那个汽车还不普及的年代，麻绳用处很广，消耗量也大。父亲是那个时代有名的麻绳匠，那时候虽然种植麻的人多，会制作麻绳的人可是千里挑一。也许是我们兄妹多，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才学了那卖苦力的手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家的炕上经常放着两辆麻绳车。在睡梦里，我经常听到父母没早没晚地摇着麻绳车，那咿咿啦啦转动的声音仿佛是一首永无尽头的歌。

第一套工序麻绳绕成像筷子一样粗细，第二套工序必须在室外进行，也就是把室内绕好的麻绳拿到室外去加工成多股合成的绳子。在室外进行第二套工序时，两辆车对着摆放，中间保持二百多米的距离，两辆车上的轴承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动，加工起来很费力气，一边至少需三个人联手合作才能转得动麻绳车的轴承，所以在室外绕绳时哥哥、姐姐、我和弟弟都得一起帮忙。如今我们兄弟身体好、力气大，估计和童年时期绕麻绳有关。父母打结系扣的手上功夫十分厉害，绑起东西来又快又结实。我在部队当兵时，每到紧急集合，打背包的速度总要比其他战友快，即使在夜里紧急集合，打背包的速度也名列前茅，领导和战友们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自己知道是童年跟着父母绕麻绳练就的手上功夫。童年时放学回家，大老远就看到那摆放好的麻绳车，父母早在那里等着我们帮忙呢！室外绕绳为预防细绳儿打结，中间有根木杆穿了六个梭子，梭子的多少由所绕绳的根数决定，常用的是一次绕六根，最粗的绳一次只能绕一根，太多麻绳车的轴承转不动，甚至会把车

子拉坏。梭子和中间的小车把细绳儿分开，小车被反向力推着向前走，小车走到头，绳子也就绕成了。绕好的绳子可以拴牛、拴马、拉车和绑各种东西，甚至还可以用来背东西。那个时代自家纳鞋底儿也需要绳子，可那些麻绳细，不用绕绳车加工，自家用小梭子，当地人称为“拔掉”，把麻吊在房屋顶上用小梭子拧成细绳儿就可以了。

那个时代，每年秋收后，父母都要外出绕绳。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春节前才能回来。父母回来时不仅带回新鞋、新帽、新衣服和过年小孩子爱玩儿的红灯笼和红蜡烛，还带回许多有趣的故事。在深夜的油灯下，父亲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着：“一个字，读九个音，有十八种含义……”我们经常听得不愿入睡。一年深秋，父母又背着麻绳车出发了，那年弟弟还不到三岁。离开娘的孩子实在可怜，一天他饿得厉害，奶奶给了他一个大月饼，他不一会儿就把月饼吃光了，可到深夜，半生不熟的冷月饼消化不了，肚子痛得他在炕上直打滚儿。从那以后弟弟一直脾胃虚弱，直到上大学时还是黑瘦黑瘦的。也就是那年深秋，父母刚走没几天的一个早晨，十二岁的姐姐给哥哥、弟弟和我做饭吃，灶台里的火不慎冒了出来，火苗越烧越高，姐姐害怕得躲在墙角不敢出声，哥哥在熟睡中感觉情况不好，醒来时发现屋里的火光熊熊快要烧到屋顶了，哥哥赶紧大声喊：“着——火——啦！”听到喊声的奶奶赶紧把水缸推倒才把大火扑灭。也就是那年深秋，做饭技术还不熟练的姐姐做菜时不慎将热油溅到了手上，把手烫得起了许多血泡。

说起那个绕麻绳的年代，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动。北方麻成熟期是在秋季，青色的麻有两米多高，砍伐后要修个大水坑，让麻在水里泡三天，然后捞出来在秋天的烈日下晒干

朝夕拾